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这一深刻论述，对于我们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要求的高度认识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的统一，是先进政党的自觉倡导和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结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传承性，是追求先进价值的重要体现，对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历史是公平的。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运用自己正确的思想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近代历史提出的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要求，它就会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力量。这里重要的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愿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国家出路而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奋斗，是以爱国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和证明：开始，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与忠君思想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虎门销烟，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斗争，但终因其历史局限而以失败告终，林则徐本人也被革职、流放。继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与民主主义要求相结合的爱国主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

兴中华”的口号，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有了明确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这时，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直接参照了西方的经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通过多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外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对内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应该说，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如果说“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而功勋卓著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只存在了三个月时间，政权就落到了封建顽固势力手里。这种时不予我的深刻原因，是帝国主义在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之后，决不容许中国独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要把中国长期保持在一种落后的状态，以便于它们掠夺中国的权益。这就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屡遭帝国主义绞杀的原因所在。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目的，绝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帮助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积80年奋斗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获得这样一个共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时代和中国的社会条件变了，救国救民必须有新的价值取向。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把爱国主义的社会理想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才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开辟广

阔前景和现实道路。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历史的结论。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所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昭示的一个真理，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理想的新的取向，不仅是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变化带来的，而且也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内在力量。毛泽东曾描述过先进的中国人寻找革命真理的历程。他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正是在科学理论和社会价值目标内在统一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把它作为新的世界观加以运用。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的传播工作并不局限在对这一理论的介绍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努力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在这时就提出要把“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要求，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表述。正是李大钊的这一工作，能够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同样，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而注入了全新的因素，发生了质的

变化。原来企求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时则转变为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钊倡导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并把争取民主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而且在科学领域，也由原来传播的自然科学之外，初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这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这不能不是中国思想界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五四运动后95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证明，我们党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使我们在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大地的面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要加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满怀信心地去实现中国梦。

上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运用，是五四精神中“进步”的最重要的体现。五四精神给了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锻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红旗文稿》2014年第11期

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道德素质要求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个性特征和思维特征。对他们道德上的要求，应循序渐进地进行道德提升，最后形成有益的个性与高尚的德行有机结合、相互助益的效果。为此，应避免领导干部道德素质要求绝对化的倾向，更多地向领导干部提一些既符合基本伦理规范，同时又不失人伦常理的道德要求，积极塑造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素质。

尊重。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尊重他人是我们的责任，这意味着把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一个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下属的领导人，就能承认他人存在的独立性，认可他人的创造性，珍惜他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成果，同时能够给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以足够的重视。尊重表现了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情感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各类困难群众，领导干部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只有尊重下属和群众的领导，才有得到下属和群众足够的尊重。

服务。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领导，领

导就是服务。服务体现了领导活动的本质。领导活动本来就体现的是对公共权力的承担，对实现公共利益的追求，而领导干部只不过是公共职位的短期占据者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指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牢记宗旨、牢记责任，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对于一个领导而言，其自身价值的最好体现，不在于其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示，而在于其利用才能多大程度上唤起了下属的干事热情，实现了领导目标，服务了人民群众。

公正。公正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公共职位的占据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领导干部必须对公正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任何不公正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在职位提拔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吏治败坏；在惩罚奖励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公平地对待人和事，实际上是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和评价自己的前提。领导干部讲公正，就是要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合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领导者

都不可能脱离合作而开展活动，从本质上说，离开他人的合作，离开下属的配合，领导活动根本就构不成领导活动。这是领导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根本所在。强调合作作为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就是说，领导人要以合作的态度开展领导。不是强调“你配合我做什么”，而是强调“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不是从形式上强调合作的必要性，而是从实质上认清合作之内在精神。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领导活动不过是整体工作的某一项工作，领导活动与执行活动，就价值层面而言，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重要性的不同。合作就要团结，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就是最大的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诚信。诚信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一个不讲诚信的政府，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个不值得打交道的政府；一个不讲诚信的领导者，在下属眼中就是一个靠不住的领导者。而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下属的信任，那么对领导的尊重也就随之消失，领导者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同时，一个不讲诚信的

领导，很难与下属建立切实可靠的关系，从而就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也难免在决策中导致这样那样的失误，以至于难以取得领导实效。诚信是一种力量，它使领导者坚定、自信、沉着，使一切虚伪者、谄媚者不自觉地产生畏惧，使敢于直言、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下属脱颖而出。

自律。自律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达到自我约束、清正廉洁的目的。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于律己，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但这在我国当前执政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在党内尚未完全建立起自我警醒、自我调适、自我纠错、自我教育、自我免疫、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的现实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更多依靠当事人的自律。“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这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严于律己的地方领导干部，能够在自己岗位上奉公守法，一心为民；而律己不严的地方领导干部，难免尸位素餐，贪婪腐败。习近平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是守住底线”。因此，能否做到严于律己就成为检验领导干部好与坏的重要标准。

《光明日报》2014年6月4日